

赖莎·戈尔巴乔娃： “我希望……”

〔俄〕赖莎·戈尔巴乔娃



赖莎·戈尔巴乔娃：

“我希望……”

〔俄〕赖莎·戈尔巴乔娃

東方出版社

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 Горбачева

“Я НАДЕЮС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сти”, Москва, 1991

根据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译出

赖莎·戈尔巴乔娃：“我希望……”

LAISHA GEERBAQIAOWA WO XIWANG

作者/〔俄〕赖莎·戈尔巴乔娃

译者/戴凤文 杨洁民 杨世招

校者/李树柏

封面设计/肖辉

版式设计/程风琴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875 字数/139,000

版次/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1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322-8/K·78 定价 5.00 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前苏联总统米·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1990年12月至1991年4月间与作家格奥尔基·普里亚欣的谈话实录。在谈话中，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她与戈尔巴乔夫的相识、结婚，戈尔巴乔夫从大学生到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政治生涯，谈了她本人对前苏联的政治、制度以及其他方面如妇女问题等的看法。书中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情况，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包括“第一手资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回忆录，其中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理解与说明，对于研究前苏联的“改革”具有参考价值，供研究者参考。原著在美国也出版了内容完全一致的版本。

目 录

1	致苏联读者
2	致国外读者
3	邀谈
14	我们都有童年
46	大学生的岁月
82	生活的考验
139	为何事忧心
203	我的希望

致苏联读者

这本书是根据国外出版人提出的问题撰写的。本书一开头，我谈到促使我对这些建议做出反应的动机，这里我就不再说了。但在写完此书之后，我又决定把它提供给苏联出版社，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出版物、电视台、电台以及记者也向我提出采访、会见和交谈的要求。在我收到的大量信件中，人们谈到了他们的想法、不幸和心愿，还提了大量“个人”性质的问题。另外也出现了不少涉及我的家庭的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我想，既然社会上对苏联总统的家庭生活感兴趣，那么最好还是让人们从通常所说的第一手材料中了解这个情况。而且对我来说，这也是向你们倾吐我的积郁、担忧和希望的一个机会。我相信，这和每一个苏联家庭以及所有珍惜我们的共同家园的人的担忧与希望都是一样的。

我是双重标准的反对者，不管它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也包括宣传报导上的所谓“内外有别”。因此你们，亲爱的读者，拿在手中的这本书，和在美国哈利尔-柯林斯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是完全一样的。

赖·戈尔巴乔娃

致国外读者

关于促使我着手写作的动机，亲爱的读者，我在本书“邀谈”一章中已经讲过了。对此只能做一点补充：近年来我是多么坚决地一次次回绝了写书和对我及我的家庭进行采访的建议，今天我决定做这件事时又是多么坚定不移。大概我所经历的情况许多人也都经历过。

《我希望……》一书问世很快，只用了4个月时间。它不是回忆录，即不是从头至尾详尽无遗的回忆。更不是系统地阐述我的观点和立场，虽然书里也写了这些东西。这是大实话，有时大概还有点自相矛盾，感情用事，花花哨哨。讲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讲述事变及对它们的追踪回忆。也是个人对下述情况的直接反应：正在发生的事情，戏剧性的冲突，震荡，总之都是我国社会生活今天表现出来的裂痕。

对我来说，这本书也是我陈述己见，做些解释和表白的机会。也是我直抒胸臆，倾吐我的忧虑和希望的机会。假如这能在你们的心中引起反响，我将感到很幸福。

至于这本书的体裁，我觉得，从我所讲的全部情况看，对这本书来说最自然的体裁是轻松的交谈。

——P. M. 戈尔巴乔娃

P. M. 戈尔巴乔娃在与作家格奥尔基·普里亚欣交谈时讲述了自己，讲述过去与现在。

邀 谈

早在 1964 年我就完全有可能认识未来苏联第一位总统的夫人。实际上她住得根本不远：离我所在的小城 200 公里。很早我就失去了父母，一开始是在这个小城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念书，后来又在这里转入劳动青年学校。那里的同班同学有一半人几乎比我年长一倍，也比我更强壮有力。我在这里开始了我的采访生涯。她经常到离我们的小城很近的地方来——沿着当地村庄泥泞的道路在秋天里艰难的跋涉，就连最偏远的地方也去看一看：进行社会学调查。

一个农村社会学学者也和农学家一样，他们的职业就是走路。此刻我面前就放着一本 1967 年印制的很小的册子，新闻纸早已发黄，上面写着：“P. M. 戈尔巴乔娃。哲学副博士学位答辩论文提要。题目是《集体农民新生活方式的形成》……”

身体纤弱，穿着胶皮靴子，挨村走动——你想把靴子从泥泞中拔出来，靴子没出来，从靴筒中跑出来的是你的一只穿着厚厚的毛袜子的脚——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农村，无论你穿什么别的鞋都不可能走过泥泞的道路。她和老太婆，和军人的寡妻喝着茶。走路的职业——农村社会学学家！虽然她未必会向她的受访人自我介绍她是“社会学家”——当时人们并不懂得这个词儿的意思。但她大概找到了别的什么农村更易理

解的词汇……

不过，我们相互认识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而且是在离这些地方很远的莫斯科。

几天前我突然接到一个建议，要我在一本基本上是传记性的书中充当交谈者。今天我被邀请到郊外的总统官邸。实际路并不太远……

汽车一进大门立刻平稳地转弯，绕过一块美丽而稀疏的树林，在我们俄罗斯，人们称这是“明亮的”树林，多半是在很早以前的什么时候栽种的。云杉和松树浓密的树冠，丰姿绰约地伸向昏暗的天空，皱纹堆垒的槭树，老态龙钟，笨重地倾向未被触动的雪地。树干掩映出一幢黄色的两层小巧别墅，整个轮廓很象上世纪末的庄园住宅。“伏尔加”停下了，我挤出汽车。于是我看到在我面前，在宽大的双扇玻璃门口，站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

她身穿宽松的花纹绒线衫——花纹不是编织的，倒象是镶上去的，印上去的，大概是家织的，颜色也是“家庭的”，煮沸的牛奶色。有一次我曾经见过她穿这件绒线衫：在共和国中央儿童门诊医院，她正来这个医院帮忙，几天前她也来过这里，完全是来工作的，她在这里呆了三个多小时。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她穿裤子。不论是绒线衫、裤子还是高坡跟布面凉鞋，对女主人来说都很合体。“您好”——一只手——象一条小船——从门口伸出来。

深棕色的眼睛，目光专注，亲切。

大厅朴实无华，看起来甚至有点过分讲求实用了。左边，在大厅的深处，有一个衣架。我的外衣挂上面显得孤零零

的。衣架下边有家用拖鞋。我一直没有换鞋。我们沿着很陡但十分清洁的楼梯登上二层。有几个画框挂在楼梯上方的墙上。女主人指着其中一个说：

“您喜欢这个猫头鹰吗？人们把能弄到的和会制做的都寄来留做纪念，特别是孩子们。连猫头鹰也寄来了。我请求把它挂在这儿。我觉得猫头鹰往往象征着智慧。不是么？”

不知道墙上的猫头鹰智慧如何，不过它确实很和善，而且根本不是灰色的。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个小孩子在画猫头鹰时把手头的各种颜料全用上了。

我们走进藏书室，然后又到总统办公室。

办公室实际上比想象中的要小得多。只不过是一间用木板镶得很美的普通房间。一进门，立刻有两件东西映入我的眼帘：一部火红色的电话，式样特别，上边有一个透明的罩子；一张放大照片，装在框子里，立在大书架空格上。谈到这部电话，我当然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个什么装置——从它那应急的颜色就能看出来。至于框子里的大照片，我没能立刻悟出什么来。

转瞬之间我便明白了，原来总统更象母亲而不太象照片上的父亲。

大照片上的人在轻快地微笑，好象刚结束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一样，一绺稀疏的头发湿漉漉的。一件军便服，领口敞开，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能明显的看出来，衣服褪色很利害。宽阔的胸前挂着一排奖章和勋章。照片上的士兵正所谓老兵。看来他已不止20岁。象拖着载重的大车一样艰难地度过战争和战后时期生活的老兵之一。从整个情况来看，照片是

战后立刻照的。

藏书室和办公室的玻璃门书橱里摆满了书籍。我力求记住，可能什么时候有机会写下来。精美的俄国历史巨著：索洛维约夫、卡拉姆辛、克留切夫斯基……在一扇橱门的后面我看见一张贴在书架格板前面的纸条儿，上边有手写的字：“朋友！请按字母放回……”女主人发现我的目光，微笑着说道：

“在这个地方，我既是秘书，又是图书馆员，又是卡片管理员，一身兼任。我想立点规矩……”

我可能是参观过总统藏书室的第一个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但我不敢肯定这一点。在一层书架的一角，有一幅在厚重的书上显得很突出的彩色照片，下边有法文签名。

“尼古拉·伯努瓦，”她解释道：“留做纪念。”

临时安排的初步参观结束了。在奢侈品中，我顶多能说出两件：藏书室里的卡累利阿桦木桌面的写字台（坐在它后面的大概只能是总统或者经典作家）和洁净。勤于打扫，乐此不疲。干净得几乎能闻到清新空气的香味，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很象是我国南方斯塔夫罗波尔农舍的干净房间。这种相似性大概是由那张放大的前线战士的照片引起的。也许这个战士受过重伤，但它毕竟从战场上回来了。在俄罗斯很少有没有这种照片的农家。镶有美丽花边网的窗帘垂得很低。看见我的目光，女主人拉开窗帘的一边。在窗外稍远处，可以看到一半被暗影遮住的树木的轮廓。是花园？

赖莎——花园……1985年3月10日……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逝世。晚10点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回家很晚，当时我们住在城外的别墅里。我们走进花园。在尚无春意的僻静的夜里，心情有些沉重。3年里3次噩耗。3位总书记，3个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疲惫不堪。一开始他沉默不语，后来才说：“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些话出乎意料，有点令人震惊。而且不仅如此。我明白，这对我丈夫来说有些突然。以前我们从未谈过这个话题。

我们在花园中慢步，雪还没有化完。丈夫又沉默了。然后仿佛开始慢慢地沉思，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在莫斯科这儿干了7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不，”我听到他说，“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话……

我们很早就坐在不大的、桌面抛光的记事桌后面。录音机开着。我手里拿着记事本和钢笔。我看到，我的交谈者无疑对今天的会见有所准备。但是，这种准备并没有我们这种人惯有的那种官僚主义派头。她甚至不用拍纸本，而是几张纸。纸是从笔记本和普通的小学生用方格本里撕下来的，有的小半张，有的四分之一，有时这摞纸里会突然出现一整张厚厚的书写纸。这摞驳杂不齐的纸非常“女性化”。她拿起面前轮到该拿起的一张纸，不时在上面记一句话，只记一句，而且带缩写，瞬间瞥一眼纸片，就象若有所思地瞥一眼纸牌一样，复述一下上面记下的句子，或者根据小注阐发一下自己的思想。

这些简要的注释也和回忆本身一样，里边没有过分注意条理性。过程多变，就象记述它的笔迹一样。我想情形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天里不知什么时候回忆起什么事，突然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还在搜寻的想法，便赶忙把这记下来，记在随手碰到的东西上。一种作风代表一个人，如果说得不错，那么在这种场合，这几张纸就不仅能反映思想作风，而且能反映一种绝非无忧无虑的生活本身。

赖莎——就这样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些话。今天千百万人在重复它们，围绕它们产生许多传说。……那天夜里大概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发生了剧变。

改革的年代……这些年给了人们什么？给了很多。我们的整个生活实现了民主化。新思维打开了国际政治的缺口。在国内和国外陪伴总统的时候，我在人的情感即赞赏和同情的海洋中看到的主要东西是：人们开始相信，过一种没有战争的生活是可能的。

改革年代赋予人们的很多，非常之多。但同时又很少。国事艰难。问题严重。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积累的问题。新事物的产生，困难重重。消费品匮乏。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用Φ. M.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在混乱的过渡时期，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各种“垃圾”，遗憾的是，即使是改革也不能没有这种危险的、破坏性的和腐蚀性的“垃圾”。难道会是另一种样子吗？总的来讲是个充满希望和担忧的时代，建树和破坏的时代，思考和怀疑的时代。

关于自己，很难启齿。始终很难，大概人人如此。但是今天，可能我特别难于谈论自己……

电话铃响了。响的不是红色电话，这一点我不用想也明白。红电话大概是另一种响声。而且也不会在办公室的主人不在时打来这个电话。红电话的铃响大概只能是他，跟着脚踪找这家的主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在办公室，在汽车里或是在主席团的例会上。

“你觉得怎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累啦？”

我没听到回答，因为我已经站起来悄悄从办公室向藏书室走去……

赖莎——谈自己很难。我已经多次收到来自各种报章杂志的建议，要求接受采访。出版社，其中包括美国的，要求为我出书——谈自己的事。我没有这么做。老实讲，我不想干。没干也没想。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是客观原因。我总觉得没有必要。我这样说不是虚情假意。干嘛要谈自己？而且是谈我。我又不是影星，不是女作家，不是女画家，不是音乐家，不是模特。更不是女政治家。不是决定人的命运和对其负责的国家领导人。我是苏联国家首脑的妻子，我力所能及的支持丈夫，帮助他，尽力而为，我一直就在这样做，从年轻时起。当时我们的命运才刚刚结合在一起。我们家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这样的共识：关心每一个家庭成员——共同关心。

1985年，因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出访和其他国家首脑来访而产生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按传统要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及礼仪活动。根据我们的前人的经验，没有这种先例。怎么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听其自然。”这样整个文明世界通行的做法就在我们这里自然而然地实行起来了。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开始亮相并有了自己的社会面貌。改革还带来了一种“自由化”，当然远非主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做的，我和丈夫今天的表现，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生活的延续。我们从未想过他会得到‘这个’新职衔。我又在自问，这样写自己或是自己谈自己是否应该？因为这主要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他的战友和拥护者们的事。他的事业实质上决定着我今天的生活。

最高领导人的妻子接受采访，出书，而且还是关于她们自己的书，这在我们这里仍然是人们所不习惯的。对美国读者来说，这大概类乎偏见。但是偏见也可能成为传统的东西，而总统的夫人大概要比总统本人更应当遵奉传统。特别是在类似的事情上。

现在我反正是在破坏从1985年以来我一直遵守的特殊的“沉默誓言”。引导我这样做的是生活的逻辑本身，是与人们的会晤和接触促成的。今天人们对我们的事业的浓厚的，真诚的，我还可以说是值得感谢的人类的兴趣，在整个世界表现得如此明显。最后，促使我这样做的还有“苏联妇女与改革”的矛盾，对我提出的问题，以及大量的信件。在一步步促使我想到写书的多次会晤中，也有在美国土地上的多次会晤。最重要的会晤是1990年夏天，与巴巴拉·布什夫人去妇女学院，在那里，姑娘们纷纷直接向我提出问题。所有这些终于使我改变了态度。

再者，这些年里出现了不少关于我的材料和文章。这些东西，善意有余，可靠性不足，有时根本就是捕风捉影——臆测、虚构甚至流言飞语成了叙述的“基础”。我请某些作者原谅，但是，若非字里行间有我的姓名，大概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也不会看出，他们的“著作”写的是我。

于是我下决心自己讲讲自己。讲一讲我对生活现象的理解，讲一讲经历过的事情，讲一讲我熟悉和珍视的东西。讲给我的满怀善意的读者，边交谈边讲。我邀请您，格奥尔基·弗拉季米罗维奇做我的交谈对象……

她把轮到的一张纸放在一旁。

“大概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恰好选中我？”我问，虽然我自己不知道对此做何解释——所以才问。

赖莎——呵，大概是因为我了解您罢。您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来自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家乡。还有，您家里有4个女孩。您大概很有人情味，很善良。这还不够么？

格奥尔基·普里亚欣（下简称**格·普**）——我认为够了。

赖莎——不。主要是您的几个孩子都和您生活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意味着许多东西。

格·普——谢谢。我承认，虽然我是第一次听到夸我，因为我们在家里时常随心所欲地吵架：七个人挤在一起，正所谓密不透风。可惜家里人没听到您这些话。

拍纸簿用完了，录音机关掉了，要喝茶了。窗外，透过纱

窗帘，可以看到一片昏暗。我们把总统办公室里被动过的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记事桌和两把圈椅。带棱的高脚玻璃盘从总统的写字台上被放回矮桌。告别的时候，我再次环顾办公室。和父亲的照片并排放在一起的，是总统妻子的稍微小一些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正当妙龄。少女面容内向，十分专注的目光直视眼前，凝神静思。

赖莎——大学毕业那年照的。您知道不久前我发现了什么？在照片上我穿的是灰色短上衣和深樱桃红色绸短衫。您能想象吗？还谈什么女人的性格变幻无常。

灰色是她喜欢的颜色之一。作家伊万·巴宁不把这种灰色简单地称作灰，而是加上个“珍珠”，文雅地称作珍珠灰。

可照片是黑白的！足见她还记得这件上衣和这件短衫。战后大学生穿的衣服不难记住，能记住的人不光是她一个。

我们还是沿着那道木制楼梯走下来。这一次在这个非常实用的大厅里，我发现了一点我此前不知为什么没曾注意到的东西。一个画得花花绿绿的小玩具房子。它旁边放着一对小雪橇。在这个十分正式的场所，散发出一种感人的新年气息。

赖莎——这是国家官邸中纯私人的“公馆”。这些玩具是小孙子的。您知道，今天他们俩生病了——感冒。

还是在那辆汽车里，经过同一座大门。出入检查口旁的红军战士站在灯下，在道别时利落地敬了一个举手礼。顺便